

地缘政治学的历史片段

施米特 禁止外国势力干涉的国际法大空间秩序

豪斯霍弗 为德国“地缘政治学”申辩

坦布斯 豪斯霍弗与太平洋地缘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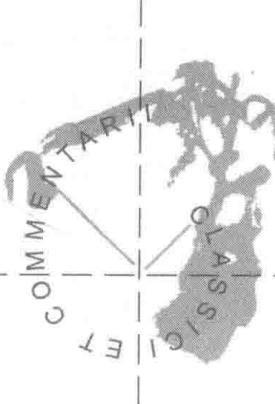
拉铁摩尔 美国与亚洲

贺晴川 《以美为鉴》与中国问题

地缘政治学的历史片段

■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编
顾问/刘小枫 甘阳
主编/娄 林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地缘政治学的历史片段/娄林主编.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8. 12
(经典与解释)
ISBN 978-7-5080-9611-7

I. ①地 … II. ①娄 … III. ①政治地理学 - 思想史 -
世界 IV. ①K901. 4-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67232 号

地缘政治学的历史片段

主 编 娄 林

责任编辑 马涛红

责任印制 刘 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9.375

字 数 210 千字

定 价 59.00 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 64663331(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古典教育基金·“资龙”资助项目

目 录

论题 地缘政治学的历史片段 (刘小枫 策划)

2	拉采尔之前的政治地理学及其最新发展	奥伯胡默尔
39	为了新世纪的瑞典 – 德国地缘政治学	图南德
63	《地理与世界霸权》德译本导言	豪斯霍弗
71	为德国“地缘政治学”申辩	豪斯霍弗
83	禁止外国势力干涉的国际法大空间秩序	施米特
158	豪斯霍弗与太平洋地缘政治	坦布斯

古典作品研究

182	《曼陀罗》中的卢克蕾佳	赖特
-----	-------------------	----

思想史发微

212	日本江户时代知识人对朱子《家礼》思想的继受
-----	-----------------------------

彭卫民

旧文新刊

236 美国与亚洲 拉铁摩尔

评 论

270 评西塞罗新译两种 弗里德兰德

280 《以美为鉴》与中国问题 贺晴川

(主编助理 柯常咏)

论题 地缘政治学的历史片段

拉采尔之前的政治地理学及其最新发展

奥伯胡默尔 (Eugen Oberhummer) 撰
史敏岳 译

[中译编者按] 本文为奥伯胡默尔为拉采尔的《政治地理学：或诸国家及其贸易和战争的地理学》(Friedrich Ratzel, *Politische Geographie der Geographie der Staaten, des Verkehrs und des Krieges*, München, 1923 第三版) 写的后记，此时拉采尔已经去世，第三版由奥伯胡默尔审读并有所增订。标题中的所谓“最新发展”，指拉采尔去世至 1920 年代初。

本文提供了政治地理学的发展简史，文献丰富，行文一贯到底。为便于阅读，本编者划分了小节，并加了小节标题，个别较长的自然段落也作了调整。

作为政治地理学的开创者，拉采尔使这门学科成为普通人类地理学 (allgemeine Geographie des Menschen) 的一个独立分支。他为

这个着实已经声名狼藉的名字重新赢回了声誉，并为其注入了新的精神。实际上，此前的政治地理学很难算得上是一门科学，尤其上世纪（〔译按〕指19世纪，下文同）最后几十年通行的地理学和政治学阐述，更是与科学相去甚远。如果要继续往前追根溯源，寻访对国家进行科学探讨的源头，就必须跨界进入政治学和国民经济学领域。拉采尔的主要功绩在于，他吸收了这些领域的成果，并赋予其地理学基础。更早理解和重视其著作的，也是政治学界，而非在熟悉新材料上迟疑不决的地理学家。

古代的地理学与政治

古代和中世纪没有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政治地理学。希腊人的地理学，注意力或者偏向作为整体的地球及其在宇宙中的地位，从而为数理地理学奠定了基础，或者放在对地球的描述和地图的构建上。当时，人们已经比较深入地阐述了人类地理学的某些基石，如民族学、城市描述、边界、交通道路和贸易等，尤其是斯特拉波（Strabo），甚至包括托勒密（Ptolemäus）。在本质上，托勒密的地理学局限于确定地表上的每个地理对象的坐标，这让我们得以在古代世界的地图上抽离出政治边界。但国家本身几乎从不是古代地理学家考察的对象。确实，斯特拉波着重强调了地理学对君主的功用（1.1, 18），^①但他本人却偏偏拒绝了这种地理学，比如，在引自恺撒的关于高卢的导言（4, 1）之后，他评论道：

① [译按] 括号中的数字表示斯特拉波《地理学》中的篇目。

一切在自然状态和民族学上相区分的事物，地理学家都必须加以阐释，但对于掌权者与时治世、多次变更的事物，给出一个一般的轮廓足矣，至于具体描述，可留待他人。

所谓“他人”，显然指史家和哲人。相对于地理学家，史家与国家的关系自古就直接得多。希罗多德（Herodot）笔下的波斯帝国、古埃及和吕底亚王国，修昔底德（Thukydides）的希腊城邦世界，珀律比俄斯（Polybius）和李维（Livius）的罗马政权，这些在我们眼前何等生动！但探讨普遍的国家概念，则是哲人的领域。柏拉图以其关于国家的名作开启了一系列论著的先河，许多人认为这是柏拉图哲学创造的顶峰。但是，若忽略其文学和艺术价值不计，则柏拉图的理想国离真实太远，无法为我们的观察提供一个触手可及的基础。即便他最后未完成的著作《法义》（*Die Gesetze*），虽然更多地探讨现实状况，却也并无什么内容可为我们所用。

直到亚里士多德，我们才被引入对城邦世界的实际考察。他的《政治学》（*Politik*）没有柏拉图笔下的文采飞扬，却更加冷静客观，立足现实，讨论政治学的基本问题，但依然未能脱离希腊小邦分立（Kleinstaaterei）的狭窄视野。在亚里士多德的观察中，最重要的是从家庭到村镇、再到城邦的发展顺序，对于我们当今的观念而言，这当然不再完全适用。随后，他过渡到对前人的批判性分析，主要针对柏拉图，并演变到对不同国家形式的深入探讨，最后描述了“最好的国家”（*bester Staat*）。我们时代谈论得很多的“自给自足的封闭体制”（*Autarkie*），最先来自亚里士多德的定义，但并非在我们今天国民经济学的广泛意义上，而是在古代城邦经济的狭小框架内。

这种经济在城邦附属的农田中获取必要的食物和原料，通过城市手工业来满足其他简单的生活需要。^① 亚里士多德还突出了气候对国家形成的影响。^② 在一部浩大的汇编《政制》（*Politien*）当中，他论述了许多城邦的政体，其中关于雅典城邦的著作于 1890 年重见天日，这对雅典政制史而言是无比珍贵的史料，但对我们的研究来说，意义不大。

在罗马文献中，西塞罗以残篇传世的《论共和国》（*de republi-*ca**）给我们留下了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相对应的作品，但与希腊人相比，显然比较薄弱。和柏拉图一样，西塞罗晚年也留下一部未竟之作《论法律》（*de legibus*），作为续篇。其中的论述主要围绕最好的国家形式的问题。在地理学上最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被称为《斯基皮奥之梦》（*somnium Scipionis*）的残篇，但其内容的方向完全不同，讨论的是地球作为天体的位置。

在罗马晚期的文献中，需要指出的有民族大迁移之初的史家马克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330—391/400）及其大量民族志和政治 - 地理说明（如 *Gallien XV*，10 – 12），成书于公元 400 年前

^①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Pol. I. 2）：“最终，由多个村镇构成的完美社会就是国家，这个共同体达到了自给自足的目标，因为生活而产生，也为了完美的生活而存在。” VII. 4 f.：“关于一个国家所允许的规模的边界，最好的定义是：在可维持自给自足生活、状况一目了然的前提下最大的人口数量……论其特征，每个人都会称赞一个最能自给自足的国家，若要如此，则国家必须能够供给一切产品。” 比较 Supan, *Pol. Geogr.* 2. A. S. 147 A. 关于位置，参见上文 S. 293. A。[译按] 中译本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页 7 及页 356；或颜一、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② Pol. VII, 7, 见拙著 *Völkerpsychologie und Völkerkunde* (Wien, 1922), 页 25。

后被称为《百官志》(*Notitiadignitatum*) 的罗马帝国国家手册(Statshandbuch)，六世纪希耶若克勒斯(Hierokles)和十世纪君士坦丁七世(Konstantin VII)的拜占庭帝国行省志，以及关于东方教会品秩等级的类似的概要(*Notitiaeepiscopatum*)。君士坦丁七世有一部用于外交的外国地理手册，载于他论“国家行政”(Staatsverwaltung)的著作中，是外交部门的一本工具书。^①

另外还有一部罗马人和外部民族之间相互遣使的记录汇编。^②特别有意思的是因弗莱塔格(Gustav Freitag)的《德意志的过往画卷》(*Bilderaus der deutschen Vergangenheit*)而流行的两则出使记录，其一出自普利斯库斯(Priskos)，载其446年奉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之命出使阿提拉宫廷一事；其二是梅南德(Menander Protektor)关于569年查士丁尼二世(Justinus II)与新兴中亚强国突厥的可汗互派使节的记载。^③

近代以来的“国家”观念

与古代哲人关于国家的论著相对应的基督教作品，是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这本书对经院哲学产生了长久的影响，但就强烈程度而言，即便是在经院哲学内部，仍然不及亚里士

^① Krumbacher, *Byz. Lit.*, 252ff.; Dieterich, *Byz. Quellen z. Länder - und Völkerk.* I, 页34, 节选亦见该书II, 49-76, 101以及下。

^② *Excerpta de legationibus*, edd. Boissevain, de Boor etc., Berlin, 1903; Krumbacher, 258ff.

^③ 译文见Dieterich II, 14-20, 相关内容，参见Oberhummer, *Die Türken und das Osman Reich*, 页26。

多德的作用；后者在大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和阿奎那（Thomas Aquinas）卷帙浩繁的评注中达到了顶峰。

一个世纪之后，文艺复兴精神也为国家观念树立了新旗帜。西欧和中欧各文化语言共有的“国家”一词都源于拉丁文 *status* [状态、位置]^①，并非偶然。这个语词起初的含义是“存在”（*Bestand*）和（共同体的）“维系”（*Erhaltung*），其今义最先来自 15 世纪的意大利，取代了 *civitas* [城市] 和 *res publica* [共和国] 这些古老的名字。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Principe*, 1514）第一章中说：“一切国家（*stati*），不是共和国，就是君主国。”^② 可见，那时人们对这个概念已经习以为常。在他笔下，甚至 *ratio status* [国家理性] 也已经出现。在英法两国，^③ *estat* 和 *state* [国家] 二词按“国家”的含义来使用，已经是 16 世纪。

在德国，“等级”（*Stand/Stände*）的含义（如尼德兰的“国会”等）^④ 仍占主导地位。18 世纪末，人们用 *Staaten* [诸邦] 来指代一个国家经过特别组织的各个领域。^⑤ 而瑞典开始使用该词，则更是晚至三十年战争时期。^⑥ 同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传统的拉丁文名称也仍然通行，比如斯来丹（Johannes Sleidanus, 1506—1556）《论皇

^① Cic. p. Sest. § 1 *pro statucivitatis*; p. Sulla § 63 *status rei publicae*.

^② [译按] 中译本见：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页 3。

^③ Shakespeare, *Hamlet* I, 4, *something is rotten in the state of Denmark*.

^④ [译按] 原文 *Generalstaaten*，荷兰语为 *Staten - Generaal*，该词在历史上亦作“尼德兰七省共和国”（1581—1795）的代名词，因为该机构是共和国主权的所有者，*Staten* 一词今作“国会”解，原为“阶级”之义，故历史上也将尼德兰国会译作三级议会。

^⑤ H. Rehm, *Allgemeine Staatslehre* (1907), p. 16 f.

^⑥ Kjellén, *Der Staats als Lebensform* (Leipzig, 1917), p. 20, A.

帝查理五世治下之国家与宗教状况》(Commentarii de statu religionis et rei publicae Carolo V Caesare, 斯特拉斯堡, 1555), 包括 17 世纪的孔灵 (Conring) 等 (见下文)。^① 博丹 (Jean Bodin) 也用《国是六书》(De la République, 巴黎, 1577) 作为其政治经济学奠基之作的题目。国家学说的继续发展从格劳秀斯开始, 受到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休谟、康德的影响, 要了解相关情况, 必须参照专业文献。^②

中古以来的地理学与政治

这种发展没有波及地理学。在文艺复兴时期, 地理学的任务是把托勒密为古代完成的工作重新拾起。各种新发现必须经过地图学上的修订, 从而统一于人们对地表的一种新印象, 其中并未给强调政治状况留下什么空间。但通过绘入分界线、徽章和零星的传说, 政治学还是得到了相应的重视。此外, 对异文化世界中组织程度更高的国家建构形态的认识, 越来越多地为在个例中阐释政治地理学提供了契机。实际上, 十字军东征与伊斯兰教各国密切接触, 早已创造了类似的机会, 更不必说去蒙古统治者宫廷所在地哈拉和林 (Karakorum) 的旅行了。在这些旅行当中, 鲁不鲁乞 (Wilhelm Rubruk) 的经典描述 (1253—1255)

^① [译按] Hermann Conring (1606—1681) 被认为是德国法制史学科的开创者。

^② Rich. Schmidt, *Allgemeine Staatslehre I*, p. 58 f., p. 74 f. 关于更早时代的情况, 参见 Friedr. Wilh. Schubert, *Handbuch d. allgem. Staatskunde von Europa* (7 卷, Königsberg 1835—1848, 未完成) I 48—76.

尤为突出。^①

后来，马可波罗基于自身的世界观，第一次描写了中国，并根据调查了解，带回了关于岛国日本的消息。^② 以利玛窦（Matteo Ricci, 1582—1610）为先驱，^③ 耶稣会士深化了对这个东亚大帝国的认识，到卫匡国（Martino Martini）绘制宏图《中国新图志》（*Atlas Sinensis*, 阿姆斯特丹, 1655）并把政治结构细分到省的级别，这一认识过程大致结束。德国医生坎普弗（Engelbert Kämpfer）在日本（1690—1692）奠定了他死后出版的主要著作的基础，^④ 成为西博尔德（Philipp Franz Balthasar von Siebold, 1796—1866）之前的权威之作。而荷兰人达佩（O. Dapper, 1636—1689）在其编纂的《亚洲》（*Asia*, 阿姆斯特丹, 1672）中，色彩丰富地描述了当时正处于鼎盛时期的印度莫卧儿帝国。

1145 年，弗莱辛的奥托（Otto von Freising）首先传播了一个观念，认为亚洲存在一个基督教帝国，受传说中的祭司王约翰统治。从 13 世纪开始，这个观念转移为非洲阿比西尼亚的基督教帝国。方济各派的修士们试图将联系引向那里，葡萄牙使者和将领为此找到了道路，如 1487—1527 年的科维良（Pero de Covilhão）^⑤ 和 1541/42 年的达伽马（Christoph da Gama, 那位伟大的发现者之子），而耶稣

^① 文本见 *Recueil de Voy. et de Mém.* IV, Paris 1839, 注释见 F. M. Schmidt, 载 *Zeitschr. Ges. Erdk.*, 1885, 及 Rockhill (带译文), 载 *Hakluyt Soc.*, II, 4 (1900)。A. Batton, *Wilh. v. Rubruk*, Münster 1921。

^② 最佳修订版见 H. Yule, *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London 1871, 3. A. v. H. Cordier, 1903。

^③ *Opere Storichedel P. Matteo Ricci*, S. J.; Macerata 1911 ff.

^④ *History of Japan*, London, 1726. *Histoire du Japon*, A la Haye, 1729. *Geschichte und Beschreibung von Japan*, Lemgo, 1777.

^⑤ [译按] 原文如此，一般写作 Pêro da Covilhã。

会士一如既往，热心勤奋地维系着这些关系。^①

西班牙人侵入美洲内陆高原，让他们开始了解那些在欧洲的想象范围里比非洲和亚洲各王国还要陌生的国家构建方式。在关于阿兹特克帝国的记载中，科尔特斯（Ferdinand Cortez）^② 写给查理五世的四篇叙述富有远见卓识，内容丰富，尤为突出。印加帝国的相关史料最近使萨尔米恩托（Pedro Sarmiento de Gamboa，1532—1592）受到了更多关注。^③ 如果再加入赫尔博斯坦（Herberstein）1549 年关于俄国的名作，以及 1553—1562 年间布斯贝克（Busbeek）和同行的邓施瓦姆（Dernschwam）^④ 两位使

^① Mig. de Castanhoso 记载了达伽马英勇的远征和阿比西尼亚的独特状况。这些材料于 1898 年被里斯本的地理学会再版，英文修订版由 R. S. Whiteway 发表于哈克路特学会 II, 10 (1902) 并附 Bermudez 的报道，德文见 E. Littmann, *Die Heldenataten des Dom Christoph da Gama*, Berlin, 1907, 见 Pet. Mitt. 1908, Lb. N. 461/2。阿拉伯人 Fakih Schahabed - din 记录了当时威胁阿比西尼亚帝国的索马里王侯 Moh. Granj 的事迹，1898 年由 A. d'Abbadie、H. Paulitschke、Futuh al Habascha 在巴黎出版。参见 Kurt Krause, *Die Portugiesen in Abessinien*, Dresden, 1912。耶稣会士的报道今收在 *Rerum Aetiopicar. script. occident. ined. cur. C. Beccari*, 卷 I – XIV, Rom 1903 – 1914。

^② [译按] 即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西文有时亦称 Hernando 或 Fernando，中译较少用。

^③ Wilh. Meyer, *Die Geschichte des Inkareiches von Pedro Sarmiento de Gamboa. Nachr. k. Gesl. d. Wiss. Göttingen*, 1893, Nr. 1。R. Pietschmann, *Geschichte des Inkareiches* (标题相同，收录了文本和一篇详细的导言)。Abhdl. d. Ges. d. W. Göttingen, N. F. VI, 4 (1906)。H. Steffen, *Anotaciones a la "Historia Indica" del Pedro Sarmiento de Gamboa*, Santiago de Chile, 1912 (*Anales de la Univ.*, 卷 129)。

^④ A. G. van Busbeek 的 “Itinera Constantinopolitanum et Amasianum” 首先于 1581 年在安特卫普出版，此后多次再版和翻译。此处相关，参见 G. Hirschfeld, *Aus dem Orient*, Berlin, 1897。R. Oberhummer 和 H. Zimmerer, *Durch Syrien und Kleinasiens* 页 8 及以下, A. Viertel, *Busbeeks Erlebnisse in der Türkei*, Göttingen, 1902。当今关于邓施瓦姆的收官之作，当属 F. Babinger 的 *Hans Dernschwams Tagebuch usw.*, München, 1923。*Stud. z. Fugger - Geschichte*, herausgegeben von J. Strieder, 7. Heft。

者的游记，我们就进入了政治出使录的领域。

在中世纪末期的威尼斯，这种文体已经高度完善。1320 年前后，老萨努多（Marino Sanudo，约 1260—1338）就已在其实录《认信十字会之秘》（*Secreta fidelium crucis*）^① 中陈说了东方各国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并阐述了对埃及的马穆鲁克帝国（Mameluckenreich）进行贸易封锁的计划。在当时的威尼斯，人们已经开始令使者在完成使命之后撰写实录，描述其在欧洲不同国家的活动和观察。这些实录保存了大量的政治 - 地理材料，最初属于国家机密，时人无从得见。其中一大部分，被小萨努多（Sanudo der Jüngere，1466—1536）收录在他 1496—1533 年间的《日记》（*Diarii*）中，直到最近才印出，可供参考。^②

兰克（L. von Ranke）最先在撰写教宗史时利用了这些史料，此后，这批材料在史家之中日益受到重视。^③ 威尼斯可能是第一个有计划地搜集其海外领土数据的国家。这些资料为后世学者所用，如帕尔驰（Joseph Partsch，1851—1925）^④ 关于伊奥尼亚群岛的专著，拉特里（Louis de Mas Latrie，1815—1897）^⑤ 和我本人对塞浦路斯的论述。

① 录于“Gesta Dei per Francos”，II，Hannover，1611. 比较 Kunstmann, *Abh. Bayer. Ak. d. W.*, II. Kl., VII, 3 (1855); Peschel, *Gesch. d. Erdkunde*, 2. A., S. 209f.; ders., *Abhandl.* I, S. 125ff. 以前托为萨努多所制的地图，现在认为系热内瓦人维斯康提（Pietro Vesconte）所作，见 Kretschmer, *Marino Sanuto*, 载 *Zeitschr. Ges. Erdk.*, 1891.

② 58. *Bde. Venedig*, 1879—1903.

③ 详见 Gustav Wolf, *Einführung in das Studium der neueren Geschichte*, § 73—75。

④ [译按] 德国地理学家，19 至 20 世纪最重要的地理学家之一，研究重点为以地理和古文字学方法考察希腊及希腊各群岛。

⑤ [译按] 法国史学家，研究重点为中世纪的塞浦路斯。